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百事·百卷·百年——中共党史大型普及丛书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

建党前十年史

董宝训 张立华 著

气势恢宏 大气磅礴

党史教育的大众精品
资政育人的权威阐释

济南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百事·百卷·百年——中共党史大型普及丛书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民主革命时期）

建党前十年史

董宝训 张立华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党前十年史 / 董宝训, 张立华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6.1
(中共党史资政专题史书系 / 丁少伦主编. 民主革
命时期)

ISBN 978-7-5488-1971-4

I. ①建… II. ①董… ②张… ③丁… III. ①革命
史—中国—1911~1919 IV. ①K25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675号

出版人: 崔 刚

策划人: 丁少伦

责任编辑: 张雪丽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1号

邮 编: 250002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71千字

定 价: 78.00元

(济南版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可随时调换)

前 言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①。“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山穷水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新的道路，并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地解决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两大历史课题。1920年，针对改良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李大钊指出，新文化运动并“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而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③同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不是几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凭空造出来的，而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演变，特别是20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④ 鸦片战争后，落后挨打的屈辱经历，使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最急迫的历史课题。如何才能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如何才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无数先进的中国人苦思苦想的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间，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种社会力量、各个政治派别，都曾为中国的命运和出路问题设计过自己的方案，并进行了各种艰苦卓绝的探索。从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朦胧向往，再到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洋务运动，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两个古老阶级均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而它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514。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1357。

③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302。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632。

终究无力承担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更无从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开辟道路。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宪运动，因为晚清政府事实上已经完全丧失了历史的合法性，而变成了注定无法实现的梦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由于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无力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正当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出路的新曙光。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不仅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思想的指导，而且找到了实现社会改造方案的现实的物质力量，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而中国共产党则成为履行这一历史使命的坚强领导者。

《建党前十年史》旨在通过对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十年间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变动规律的考察，探索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必然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演变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社会变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加强对这一特定时期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理解。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了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表了《如何研究中共历史》的讲话，系统地论述了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经验教训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在谈到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运动的发生时，毛泽东指出，大革命的发生是长期革命积累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大革命运动之所以发生的最重要的准备。他说：“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开始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反复强调，“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①

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不仅具体揭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而且清楚地揭示了一个伟大政党的孕育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讲，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然，辛亥革命也不是凭空发生的，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晚清政府及其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因此，《建党前十年史》在阐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同时，在时间跨度上向前的必要追溯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是保持叙事结构完整性的需要，也是保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逻辑链条完整性的必然要求，这一点也是本书在付梓前需要特别说明的。

^①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402—404。

目 录

001

目
录

导 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与世界	(001)
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001)
二、瓜分中国的狂潮和列强在华共管体制的形成	(003)
三、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	(010)
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012)
第一章 晚清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全面爆发	(016)
一、濒临崩溃的王朝经济	(016)
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020)
三、此起彼伏的反清斗争	(026)
四、内外交困下的“新政”自救	(028)
五、立宪骗局与清朝合法性的彻底丧失	(037)
第二章 孙中山开启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	(046)
一、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	(046)
二、同盟会的成立与“三民主义”的提出	(050)
三、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争	(061)
四、各地反清武装起义	(072)
第三章 立宪运动的兴起与衰落	(082)
一、立宪思潮的兴起	(082)
二、立宪团体的建立	(089)
三、立宪运动的开展	(094)

四、立宪运动的破产	(107)
第四章 未完成的革命	(111)
一、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11)
二、武昌首义与各省响应	(114)
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建立	(125)
四、袁世凯东山再起与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	(132)
五、帝制的终结	(138)
六、未完成的革命	(141)
第五章 资本主义宪政理想的破灭	(147)
一、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	(147)
二、政党政治的雏形	(151)
三、宋教仁喋血	(163)
四、袁世凯帝制自为与资本主义宪政理想的破灭	(169)
第六章 制度转换失败与军阀混战乱局	(181)
一、传统秩序崩塌后的权威危机	(181)
二、皖系军阀的崛起	(187)
三、府院之争	(193)
四、直系军阀的演变与直皖战争	(199)
五、西南军阀势力的崛起	(207)
第七章 革命党人的继续奋斗与挫败	(212)
一、二次革命	(213)
二、中华革命党的成立与护国战争	(221)
三、捍卫“共和”的努力与护法运动的失败	(237)
四、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244)
第八章 知识精英对救国道路的新探索	(251)
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252)

二、新文化运动的开启	(259)
三、改造国民性的努力	(273)
四、知识精英的各种救国梦想	(279)
第九章 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286)
一、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287)
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阶级意识的觉醒	(298)
三、新思潮的涌人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306)
四、改造社会的探索	(313)
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319)
六、各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和中共一大的召开	(332)
参考文献	(345)

导论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与世界

20世纪初期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的过渡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而且使世界政治力量的均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在进一步加强国际资本主义对全球统治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争夺变得更为激烈。在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中，清政府最终沦为“洋人的朝廷”，始于鸦片战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秩序，到此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完全成型。

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

001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在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条件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即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并在经济生活中占据了统治地位，由此引起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垄断现象的出现，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事实，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被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

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经济特征是垄断组织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里占据了统治地位。以美国为例，垄断组织已经控制了70%的金属加工业、66%

的钢铁工业、81%的化学工业、85%的铅的生产、95%的煤炭和石油生产。^①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等国情况也大致如此。由此可见，垄断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全部经济生产的基础。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实现垄断化的同时，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和走上垄断。英国的5大银行集中了全国存款的40%，德国柏林9大银行集中了全国存款的49%。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这些金融寡头运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竞选和国家官吏，左右政府的内政和外交。随着各国垄断统治的建立，国内市场的相对狭小促使资本家把大量剩余资本输往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资本输出的增加和对国外市场的掠夺，导致了各垄断资本集团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如在1907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与德国电气总公司签订了瓜分国际市场的协定，前者分得了美洲，后者取得了欧洲市场的垄断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全世界约出现过114个国际卡特尔。

谋求垄断高额利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决定性动机，但是，从根本上讲，垄断并不能消除竞争，而只能使竞争更加剧烈和更具破坏性。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的加剧，各国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变化，重新瓜分世界领土成为以垄断资本为主导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形式。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和法国两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已经放慢，而美国、德国、日本、俄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迅速崛起。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地位和战略地位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经济实力的这种显著变化，给国际政治生活和争夺殖民地的斗争带来重大影响。到19世纪末，英国占有的殖民地面积约为德国的9倍，法国的为德国的3.5倍。由于“我们这个行星上无主的土地都被霸占完了。世界上已第一次被瓜分完毕，所以以后只能是重新瓜分，也就是从一个‘主人’转归另一个‘主人’，而不是从无主的变为‘有主的’”^②。在新的竞争格局下，一方面，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不仅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还希望扩展新的海外领地。正如英国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罗得斯所说：“为了使联合王国4000万居民免遭流血的内战，我们这些殖民主义政治家应当占领新的土地来安置过剩的人口，为工厂和矿山生产的商品找到新的销售地区。我常常说，帝国主义就是吃饭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

^① 逢秀贞等主编，《政治经济学新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216。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640。

战，我们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① 另一方面，德、日、美等后起帝国主义国家强烈地觊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当旧的均势被打破后，列强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也就难以避免了。帝国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而且也是“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②。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作为仅存的少数半殖民地国家之一，自然难逃被列强重新瓜分的厄运。而中国被深度卷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现实，也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生态产生深远影响。

二、瓜分中国的狂潮和列强在华共管体制的形成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是由中日甲午战争所引发的。日本是一个岛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同样受到欧洲列强的侵略，但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本性。在日本征服世界的狂妄计划中，矛头首先指向朝鲜和中国。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就确定了对外扩张政策，并于1887年拟订了《征讨清国策》的战争计划，准备在5年以后对中国开战。为此，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扩充海军，并于1890年完成了军备改革，做好了对华开战的准备。

1894年5月，日本利用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的时机劝诱清廷出兵朝鲜，挑起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海面向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陆军向驻扎在朝鲜牙山的中国陆军展开进攻，并很快将战火从朝鲜燃烧到中国的辽东和山东威海地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

从19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虽然一再败于西方列强，自忖不如“西夷”，却并不把小小的“东夷”日本放在眼里。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不仅清政府，就连某些西方人士也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美国海军部长特蕾西在1889年的年度报告中认为，中国海军实力在世界上列第九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国和日本之前。^③ 曾经担任过北洋海军教官的英国人琅威理也说，中国海军和日本相比并不逊色，如果交战，一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642。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578—579。

^③ 转引自房德邻，《清王朝的覆灭》，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3。

定能够战胜日本。^①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在海战和陆战中全面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仪式

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清王朝的腐败与无能。如果说在战前，列强对中国的实力还有几分疑惧的话，那么经过这场战争，疑惧已荡然无存了。中外关系由此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

一位英国学者曾这样分析甲午战争对中外关系的影响：“中国问题于1894年开始形成。这个问题本质上是：究竟中国是否将继续在政治上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抑或被几个主要强国所瓜分。一心要建立帝国的日本岛国人民的政治野心使这个问题被更快地提出来。他们的军队在山县的指挥下，打破了中国实力的虚名，直到那时为止，这个虚名曾遏止了欧洲国家对中国执行侵略政策。日本人不自觉地造成了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终于成为一种世界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按：指20世纪20年代），一直影响着欧洲几个主要强国之间的和平及其贸易。当巴尔干的争夺已经结束及非洲的瓜分即将完成的时候，中国的衰弱被日本揭露了出来，这就招致了殖民国家向中国提出它们的权利要求。它们的对华关系，在1894年以前基本上是商业关系，此时变为以政治为主了。”^②由此可见，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引发了中国被列强瓜分的深重危机。

当然，列强割占中国的领土不是从甲午战争后才开始的。早在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就逼迫清政府割让香港，从此开创了割占中国领土的恶劣先例。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又通过中英《北京条约》割占了中国

^① 林乐知著译，蔡尔康纂辑。中东战纪本末。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一辑。文海出版社，1980：29。

^② [英]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1959：38—39。

的九龙司地方一区。与中国毗邻的俄国，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向亚洲扩张，于是中国就成为其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趁火打劫，在1858年至1864年间，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1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入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地区接连遭到外国侵略，海疆陆疆频频告急，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但是相对来说，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还没有把中国当作瓜分的主要目标，它们对华关系的重点仍在于商品输出，瓜分中国的狂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的。

1895年4月2日，日本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和德国外交部参事米尔堡有过一次谈话，内容涉及战后中国的局势。青木对米尔堡说，日本将要求割占中国的一部分，尤其是辽东半岛和旅顺口。米尔堡建议日本占有台湾，因为那对日本更为有利。青木对此笑而不答。青木还分析了其他列强将会对中国采取的行动，他认为俄国对中国的北满有所图谋，英国一定会占有舟山岛。最后他向米尔堡建议，德国可以在中国东南要求一省，它比全非洲的殖民地更有价值。米尔堡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①两人的谈话赤裸裸地暴露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贪欲，也加深了各国在华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日本割占辽东半岛，首先引起俄国的强烈反应，认为这是对俄国独霸东北的直接威胁。为此，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向沙皇建言：“为俄国的最大利益着想，要求维持中国的现状”，“决不可让日本渗透到中国的心脏而在辽东半岛攫得立足点”。^②于是，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政府正式向法、德两国政府建议，三国采取一致行动，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行动”^③。

1895年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政府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退还辽东半岛。与外交交涉相配合，三国军舰也同时开进日本海面，以武力威胁日本就范。日本政府自忖无力与三国抗衡，企图求助英美化解危机。然而，英美并不愿看到日本在华实力的过分膨胀，反而劝告日本接受三国要求。在欧洲列强的压力下，日本被迫退还辽东半岛，同时向清政府索取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作为补偿。

^①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0：20.

^② 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编写组. 中国近代史. 中华书局，1983：232.

^③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 商务印书馆，1960：29.

“三国干涉还辽”使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慈禧和李鸿章等人主张“一意联络俄人”，借以牵制其他列强。殊不知，“三国干涉还辽”正是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始。从表面上看，“三国干涉还辽”维护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主权，而实际上只是暂时遏止日本的割占，为它们自己利益的获得保留机会。围绕日本割占辽东半岛的国际干涉，实际是列强瓜分中国的一场斗争，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前奏。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德、法自恃对中国有功，争相要求中国给予“回报”，而它们得到的每一个“回报”，又成为英、美、日要求给予“补偿”的借口。于是，列强为控制和瓜分中国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角逐。

此后，列强争夺中国的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通过对华政治借款，攫取筑路权、开矿权、租借权等一系列手段，列强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取得了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地位的优势。为了确保和扩大这种优势，列强或迫使清政府发表声明，保证不把它们已取得优势的地区出让给其他国家，或彼此间达成协议（有时是一种默契），承认对方在中国某一地区具有特殊利益，把所控制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表面上是对经济、政治权益的争夺，背后隐藏的却是中国被瓜分的深重危机。德国外交大臣毕鲁于1898年4月27日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德国对瓜分中国的态度。他说：“曾经有人提到瓜分中国，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瓜分不会由我们来促其实现。我们已经完成的一切都是为了做好准备，以便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们自己都不致落得两手空空。旅客不能决定火车什么时候开动，但他能够做到火车开动时不致误车。傻瓜才会落在最后。……我们已经获得了胶州这样一个战略上政治上的据点，它将使我们在未来的远东具有决定性的势力。根据这样一个强固的据点，我们可以安然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①也就是说，德国将以它的势力范围山东为据点，随时准备参与瓜分中国。这也是英国和法国的基本态度和方针：不启动瓜分中国的列车，但绝不误车，更不做落在最后的傻瓜。而中国的两个近邻日本和俄国却总想启动这列瓜分的列车，只是它们当时还没有力量去启动它，不得不暂时满足于划分势力范围。

当列强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时，美国正忙于和西班牙进行争夺菲律宾的

^① [英] 肯德. 中国铁路发展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8: 138.

战争，暂时顾不上参与瓜分中国。然而，作为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列强的对华争夺中，美国绝不会置身事外。

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把号称“世界工厂”的英国甩在了后面。生产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壮大，使美国资产阶级在海外开拓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要求变得更为迫切，而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中国则被美国工商界看作一个“不可估量的”、“最大的世界市场”。但在美西战争之后，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已经大体划定，重要和富庶地区都被分割占有，美国已无处插足。何况，美国的对华野心并不限于一个地区、几个口岸，它要的是整个中国市场。于是，“门户开放”政策便成为美国凭借经济实力独霸中国市场的最好选择。

1899年9月24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驻英、德、俄、法、日、意六国公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了一项照会，要求各国同意在华实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承认列强在华已划定的“利益范围”中的特殊利益和各项既得利权，同时要求保证各国在“利益范围”中得到“平等待遇”，即“自由贸易”。

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这一矛盾终于在1900年以义和团运动的方式全面爆发。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局势，始则企图利用义和团运动相要挟，利令智昏地对列强宣战，待到八国联军兵临城下，便立刻露出了卖国的嘴脸，转而出卖义和团，乞求列强的“谅解”，并率文武官员仓皇逃亡西安。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一些军事首领在面对中国民间的自发反抗时，表达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难度。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一份奏报中，针对德皇“常有瓜分中国的思想”提醒说：有一事不应忘记，即中国共有人口四万万，“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① 瓦德西在天津领事馆的一次讲话中更断言：“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施行统治之善政，乃万事之最难者，况欲制御此亿万之众，岂能遽以轻便之心行之乎。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②

^① 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6—87。

^② 瓦德西拳乱笔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44。

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也承认：“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中国是最不宜瓜分的。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更齐一，更团结，更被古老的带子和魅力拴在一起了。”^①

反对瓜分中国的赫德也指出，瓜分“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口，永远也不能期望那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骚动、不幸和不稳定将会贯穿于以后的世世代代里”，中国人民必然要“反对各个外国统治者”，到处“表现出民族情绪的存在和力量”。^②“各国于支那问题，大率不外三策，一曰瓜分其土地，二曰变更其皇统，三曰扶植满洲政府。然变更皇统之策，无人足以当之，骤难施行。今日之计，唯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其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安坐以收其实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③赫德的话道出了帝国主义各国的侵华策略——以华治华。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就一步步成为列强在华利益的代理人，但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前，在列强看来，清政府这个代理人并不驯服，如1840年鸦片战争、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战争，直到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向列强宣战，而义和团运动更给西方列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因此，列强在1901年《辛丑条约》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清政府完全驯服，使其彻底变成列强“以华治华”的得力工具。

《辛丑条约》规定外国有在使馆和京津一线的驻军权，对使馆自行保护。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武装化的使馆区，列强获得了租界和附属地所具有的一切行政、警察、土地、司法权力。使馆驻兵的数量并不多，但具有殖民统治的象征意义和威慑作用。

《辛丑条约》规定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从近代国际关系的需要来看，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有其必要性。但列强逼迫清政府做这种改变，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清政府，为列强对华的掠夺和侵略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

^① 转引自齐鲁书社编辑部.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 齐鲁书社, 1982: 15.

^② 转引自齐鲁书社编辑部. 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集. 齐鲁书社, 1982: 15.

^③ 张树, 王忍之编.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 第1卷上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60: 254.